

隋唐五代史

呂思勉史學論著

呂思勉史學論著

隋唐五代史

上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呂思勉史學論著

隋唐五代史

下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呂思勉史學論著前言

呂思勉先生（一八八四——一九五七），字誠之，江蘇武進（今常州市）人。畢生專心致力於歷史研究和歷史教學工作，對於中國古代史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的一生，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一生；又是刻苦鑽研、勤奮著書的一生。在現代我國著名歷史學家，他是讀書廣博而重視融會貫通的一位，又是著作豐富而講究實事求是的一位。五十年中，先後著有兩部中國通史、四部斷代史、五部專史和其他多種史學著作，都很有學術價值，素為國內外史學界所推重。

呂先生早年執教於蘇州東吳大學、常州府中學堂和南通國文專科學校，辛亥革命後任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編輯，一九二〇年任瀋陽高等師範學校教授，一九二二年執教於蘇州省立第一師範專修科，一九二五年任滬江大學教授，從一九二六年起，長期擔任光華大學歷史系主任兼教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回常州舊居，到附近游擊區中學執教，依靠預支稿費勉強維持生活。抗戰勝利後，繼續擔任光華歷史系主任。解放後院系調整，光華併入華東師範大學，就在該校歷史系任教，被評為一級教授。

呂先生從二十三歲起，就決心獻身於祖國的學術事業，以閱讀《二十四史》為日

課，寫作讀史札記，這樣孜孜不倦地五十年如一日，先後把《二十四史》反復閱讀了三遍。所作讀史札記，着重綜合研究，講究融會貫通。他之所以能够不斷寫出有系統、有份量、有見解的歷史著作，首先得力於這種踏實而深厚的基本功。同時他又愛好廣泛閱讀新出版的報刊雜誌，十分注意當時從西方不斷引進的新文化、新思想和新的研究方法。一九二〇年他參與《建設雜誌》展開的中國古代有無井田制的辯論，發表了給廖仲愷、朱執信的公開信，長達七千字，支持廖仲愷的見解，認為井田是土地由公有轉變為私有之後的一種殘餘形態，並從方法論上反駁了胡適所謂井田是孟子烏托邦思想的說法。這就是他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就在這年的年底，在歷年教授通史的講稿的基礎上，寫成了四冊《白話本國史》，這是他的第一部歷史著作。接着，在滬江大學講授中國哲學史，又寫成了《理學綱要》初稿。此後呂先生的大量著作，都是在光華大學任教的二十多年間陸續寫成的。

呂先生先後寫成兩部中國通史，即《白話本國史》（一九二三年商務版）和《呂著中國通史》（上冊一九四〇年開明版，下冊一九四五年開明版）。《白話本國史》，由於它的內容、體例和寫法，正適合當時如饑似渴的青年學生精神食糧的需要，不僅長期被用作大學的通史教本，而且成為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發行量很大的普及歷史讀物，它首先強調「用新方法整理舊國故的精神」，《緒論》開頭強調的就是社會歷史的變遷

進化，認為宇宙間一切事物，「都是常動不息的，都是變遷不已的」，變遷有着因果關係；作為歷史的「社會現象也是宇宙現象之一，它的變遷進化，也脫不了因果關係」；因此，「歷史者，研究人類社會之沿革，而認識其變遷進化之因果關係者也」。這是樸素的正確的歷史發展觀點。當時呂先生對於社會變遷的觀察十分敏銳，既看到了春秋戰國之際是一個「大變遷」時期，「是三代以前和秦漢以後社會的一大界限」；又看到了「從秦漢以後，直到前清海禁大開以前，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沒有根本變化」。他認為秦漢以後社會的長期停滯，是和政治上多次出現周期性的治亂興衰的反覆有關，而政治上之所以會不斷出現治亂興衰的反覆，「這是由於生產方法和生產社會組織沒有變更的緣故」。同時他又指出秦漢以後經濟政治也還不斷有發展變化，唐代安史之亂以後顯然與其全盛時期不同。因此他把秦以前稱為「上古」，唐代全盛時期以前作為「中古」，安史之亂以後稱為「近古」，清代中期以前稱為「近世」，「西力東漸」以後稱為「最近世」。這些分期的看法對此後史學界有很大的影響。

《呂著中國通史》寫成於抗日戰爭期間，上海成為「孤島」時候，是爲了適應當時大學文科教學上的需要。上冊分門別類地有系統的敘述了社會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學術的發展情況，下冊分章按歷史順序有條理的敘述了政治歷史的變革。寫作的目的，在於使讀者了解中國歷史的大概，「因而知現狀的所以然，對於前途可以

預加推測；因而對於我們的行爲可以有所啓示」。作者一方面通過對經濟制度和社會改革思想發展歷史的敘述，指出必然走向社會主義的趨勢，認爲主要阻礙中國農業發展的，是土地私有制和小農制，唯一的出路就是效法集體農場，推行大農制。作者另一方面又通過對政治制度和政治改革思想發展歷史的敘述，指出必然走向民主政治的趨勢，認爲長期流傳的旁薄鬱積的民主思想，必將隨着時勢的發展而成爲行動。此書最後一章是「革命途中的中國」，作者用「大器晚成」的成語預祝革命必將成功，最後果斷說：「悲觀主義者流，君歌且休聽我歌，我歌今與君殊科。」並且借用英國文豪拜倫的詩，作爲全書的總結：「如此好山河，也應有自由回照。……難道我爲奴爲隸，今生便了？不信我爲奴爲隸，今生便了。」這些話反映了當時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羣衆的殷切願望。

呂先生並努力於斷代史的研究，先後寫成《先秦史》（一九四一年開明版）、《秦漢史》（一九四七年開明版）、《兩晉南北朝史》（一九四八年開明版）、《隋唐五代史》（一九五七年上海中華版），共約三百萬字。他認爲，當時對各個時期各方面的史料缺乏系統的整理和考核，要在短時期作出通貫全局的綜合和分析還很困難，爲了實事求是起見，把每部斷代史分寫成前後兩部分：前半部是政治史，按歷史順序編排；後半部是社會經濟文化史，採用分門別類的敘述辦法。由於史料過於分散，需要從浩

如烟海的典籍中披沙揀金地鉤稽出來，作者在這裏是化了極其艱巨的勞動的。但是這些書在資料的運用上也還有不足之處，就是沒有利用新發現的考古資料，沒有能够使地下史料和紙上史料密切結合起來。

《先秦史》在運用史料上的缺點比較突出，它沒有能够依據甲骨文、金文以補文獻的不足。但是作者在選擇重點和分析問題上還是有其卓見的。在政治史方面，着重抓住各個階段主要政治鬥爭作為貫串的線索。在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方面，注意於分析各種制度的起源和變化，其中有不少精辟的見解。例如講到貴族內部的選舉，「其初蓋專取勇力之士」，「觀鄉大夫既獻賢能之書，復退而行鄉射之禮，可見古者專以射選士」；「古之選舉，其初蓋專於鄉，以其為戰士所治之區也」。這些論斷，指出了先秦貴族尚武的本色，其所謂「賢」原先是指勇力。再如說：「刑之始，蓋所以待異族」，「古以兵刑為一」，古代掌刑之官稱為「士」或「士師」，「士者戰士，士師者士之長，其初皆為軍官」。「髡即越族之斷髮，黥即文身」，「其初蓋俘異族以為奴婢，後則以本族之犯罪者，亦以奴婢而儕諸異族，因以異族之所為飾者施之」。這樣追溯刑法的起源，既有論據，又符合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

《秦漢史》是與《先秦史》互相銜接而又獨立成書的。由於作者對《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所下的功夫很深，對於這個時期各方面歷史的敘述和分析，十分札實

而有條理。作者認為這段時期內，就社會組織來說，新莽和東漢之間是一大界線，從此豪強大族勢力不斷成長，封建依附關係進一步加強，終於導致出現長期割據分裂的局面。此書把兩漢政治歷史分成十一個段落，既作了全面的有系統的敘述，又能抓住重點作比較詳盡的闡釋。對於社會經濟部分，敘述全面而又深入。作者根據當時社會的特點，把豪強、奴客、門生、部曲、游俠作了重點的探討。同時又重視由於社會組織變化而產生的社會特殊風氣，對於「秦漢時的君臣之義」、「士大夫風氣變遷」，都列有專節說明。對於政治制度和文化學術部份，分成許多章節作了細緻的論述，其中不乏創見。作者認為神仙家求不死之方，非盡虛幻，不少部分與醫學關係密切，諸如服餌之法、導引之術、五禽之戲，都有延年益壽的功效。至於道教的起源，當與附會黃老的神仙家、巫術家有關，當時分成兩派流傳：一派與士大夫結交，如于吉之流；一派流傳民間，如張角的太平道和張脩的五斗米道，兩派宗旨不同而信奉之神沒有差別，道教正是由於這兩派的交錯發展而形成。

《兩晉南北朝史》又是與《秦漢史》銜接而又獨立成書的。這是中國史上最錯綜複雜的一個階段，政治上長期分裂，許多民族大遷移，政權的變動又十分頻繁，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錯複雜，記載這段歷史的典籍分散而繁複。呂先生化費很多精力，把歷史發展線索整理得井井有條，成為他所著四部斷代史份量最大的一部。這時社

會經濟雖然在動亂中不斷遭到破壞，還是曲折地得到發展的。呂先生對於這點是十分注意的，「農業」一節指出「東渡以後，荊揚二州，農業大盛」。「工業」一節講到了百剛（鋼）刀、宿鐵刀（採用灌鋼冶煉法制成）、指南車、千里船等等的制造。所有這些都為唐宋時代經濟繁榮和科學發展準備了充分條件。隨着經濟的發展，生活方式也有很大改進。「飲食」一節指出這時烹飪之法日漸講求，開始成為技藝，晉代何曾著有《食疏》，北魏崔浩著有《食經》。「衣服」一節指出這時服裝大有變化，古人以上「衣」下「裳」作為禮服，把連接「衣」「裳」的「深衣」作為便服，「袍」「衫」就是從「深衣」變化而來；這時開始以「袍」「衫」為禮服，反而把上「襦」下「裙」作為便服。所有這些對於唐宋以後的生活方式有着深遠的影響。兩晉南北朝的文化學術，雖然受到宗教和玄學思想泛濫的影響，但是經學、史學、文學、美術、自然科學還是有重大成就的，這為唐宋文化的高度發展奠定了基礎。關於這方面，此書也作了詳細的闡述。

《隋唐五代史》的體例和前三部斷代史一致，相互連貫，這個時期正是中國封建社會高度發展的階段，一時人才輩出。作者除了分析促使高度發展的社會和政治的原因以外，也注意到了君主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作者認為，即使是有為之君，也有其兩面性，其優劣祇能從比較中看出。此書推重隋文帝，認為是「賢主」，他壞的一面是用刑嚴酷，好的一面是勤政而能「寬恤民力」，因而戶口增加，府庫充實。唐太

宗好的一面是容受直言，渴於求賢，壞的一面是有驕暴之習和侈靡之心，因此貞觀之治是有成績的，而史書所謂「太平」景象不免是夸辭。作者爲了闡述盛唐之世經濟繁榮景象，說明唐代政治制度上的重大成就以及文化學術上的巨大發展，搜集了大量史料，使用很多篇幅來加以分析。例如「選舉」分成上下兩節，上節講科舉之制，下節講舉官之制。關於科舉之制，不僅分科作了敘述，還對考試的方法、科舉的得失流弊以及防弊之法，都分別作了探討。

呂先生更著有五部專史，便是《中國民族史》（一九三四年世界版）、《先秦學術概論》（一九三三年世界版）、《理學綱要》（一九三一年商務版）、《宋代文學》（一九三一年商務版）、《制度史五種》（一九二九年中山書局版）。《中國民族史》重點分析了十二個民族的源流，很有獨到的見解。作者認爲周圍少數民族可以分爲南北兩派，正不斷和中原漢族融合。歷來南派與漢族矛盾較爲緩和，而融合較緩慢；北派與漢族矛盾尖銳激烈，而融合較迅速。《先秦學術概論》着重分析先秦學派的源流及其相互關係，兼及縱橫家、兵家、農家、數術、方技、小說家和雜家，也還述及各派重要著作的主要內容，並論及其真僞。因此這書不同於一般思想史著作而有其特色。作者反對胡適的「諸子不出王官論」，認爲《漢書·藝文志》諸子出於王官之說不能全盤否定。由於「社會組織既變」，從春秋以前的「王官之學」變爲「私家之學」，這是「世運之

遷流，雖有大力，莫之能逆」，例如道家之學確實出於史官，正因為他們總結了歷史上「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理」，才會提出立足於「清虛」「卑弱」的鬥爭策略。《理學綱要》着重分析十多位理學大家的哲理，有提綱挈領的優點。《宋代文學》分類介紹宋代名作家及其代表作，對一代文學起了畫龍點睛的作用。《制度史五種》，對於國體、政體、階級、宗族、婚姻五種制度作了貫通古今的論述，既有系統條理，又多真知灼見。

呂先生除了努力從事通史、斷代史、專史的著作以外，也還講究史學方法的探討，著有《史學四種》，便是《歷史研究法》（一九四五年永祥印書館版）、《中國史籍讀法》、《史通評》（一九三四年商務版）和《文史通義評》，目前已匯編成一書，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時他還把文字學作為研究古代史的必要工具，著有《文字學四種》，便是《中國文字變遷考》（一九二六年商務版）、《字例略說》（一九二七年商務版）、《章句論》（一九二六年商務版）和《說文解字文考》（待刊）。由於先秦史料比較特殊，爲了指導青年學習，又著有《經子解題》（一九二六年商務版）。呂先生的讀史札記，除了陸續發表於報刊雜誌以外，又曾先後出版《燕石札記》（一九三七年商務版）和《燕石續札》（一九五八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現在已把已刊和大量未刊的札記，匯編成《呂思勉讀史札記》一書，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目前正在編輯中的有《呂思勉論學集》，

將搜輯他歷年發表的論文和未刊文稿，彙編成書。其他未刊著作也將陸續整理付印。我們爲了適應當前史學界深入開展研究的需要，決定把呂先生史學著作彙合成爲總集出版，稱爲《呂思勉史學論著》。現在先重印四部斷代史，其他著作也將陸續刊布。爲了保存原著的本來面目，採用了影印和原紙型重印的辦法，除改正個別錯字以外，不作更動，標點也一仍其舊。書中沿襲舊史書上的名詞如「封建」、「革命」等等，顯然和今天常用的意義不同，我們也未作改動。書中沿用過去正史上四裔傳的用語和觀點以及對外關係的用語和觀點，也都保持原樣。希望讀者閱讀時注意。

呂思勉史學論著編輯組（楊寬執筆） 一九八二年一月

總論

論史者率以漢、唐並稱，其實非也。隋、唐、五代，與後漢至南北朝極相似，其於先漢，則了無似處，何以言之？

先漢雖威加四夷，然夷狄之入居中國者絕鮮，後漢則南單于、烏丸、鮮卑、氐、羌，紛紛入居塞內或附塞之地，卒成五胡亂華之禍。而唐代亦然，沙陀入據中原，猶晉世之胡、羯也。蕃、渾、党項，紛紜西北，卒自立爲西夏，猶晉世之氐、羌也。而契丹雄據東北，與北宋相終始，亦與晉、南北朝之拓跋魏極相似，一矣。漢有黃巾之起，而州郡據地自專，終裂而爲三國，唐有黃巢之起，而長安之號令，不出國門，終裂而爲五代十國，二矣。不特此也，漢世儒者，言井田，言限民名田，法家則欲行均輸，筭鹽鐵，初猶相爭，鹽鐵論賢良文學與御史大夫之爭是也。至新莽遂合爲一，田爲王田，兼行五功均，六筭是也。

雖不成，其欲一匡天下，措斯民於衽席之安，其意則皎然也。而自魏、晉以來，人競趨於釋、老，絕不求矯正社會，而惟務抑厭其本性，以求與之相安。本性終不可誣也，則并斯世而厭棄之，而求歸於寂滅，爲釋、老者雖力自辯白，然以常識論之，豈不昭昭如此耶？常人論事，固無深遠之識，亦鮮偏蔽而去實際太遠之病，順世外道之所由立也。夫舉一世而欲歸諸寂滅，是教社會以自殺也。教社會以自殺，終非社會所能聽從，故至唐而關佛之論漸盛，至宋而攘斥佛、老之理學興焉。然宋儒之所

主張者，則以古代社會之組織爲天經地義，而強人以順從古代之倫紀而已；人心之不能無慊於古道，猶其不能無慊於今日之社會也。而宋儒於此，亦惟使人強抑其所欲求，以期削足而適履，此與言佛、老者不求改革社會，而惟務抑壓人之本性者，又何以異？此又其若相反而實相類者也。世運豈真循環耶？非也。世無不變之事，亦無驟變之物，因緣相類者，其所成就，亦不得不相類，理也。然則自後漢至於南北朝，與夫隋、唐、五代之世，其因緣之相類者，又何在也？

人性莫非社會所陶甄，今世社會學家言：人類已往之社會，大變有四：曰原始共產社會，曰奴隸社會，曰封建社會，曰資本主義社會。原始共產之世，遐哉尙已，吾儕今日，僅得就古先哲人追懷慨慕之辭，想像其大略而已。我族肇基之地，蓋在江、河下游？故炎、黃交戰及堯、舜所都之涿鹿，實在彭城，世本。與今稱爲馬來，古稱爲越

人者密邇。其爭鬥蓋甚烈？吾族俘彼之民，則以之爲奴隸，故彼族斷髮文身之飾，在吾族則爲髡、黥之刑。本族有大罪者，儕族之異。苗民之所以見稱爲酷虐者以此。古所謂刑者，必以兵刃虧人體，至於不可復屬，此其始皆用諸戰陣，施諸異族者也。苗民之作五刑，蓋以施諸異族者，地及本族也。黃帝書稱其清

問下民，亦侯之門仁義存耳，其所恃以自養者，恐亦無以異於三苗也。此吾國之奴隸社會也。江、河下游，古多沮澤，水利饒而水患亦深，共工、鯀、禹，仍世以治水爲務，共工與鯀皆蒙惡名，而禹獨擅美譽，非其治水之術，果有以大異於前人也。自夏以後，吾族蓋稍西遷？夏代都邑，皆在河、洛。西遷而水災澹焉，則以爲神禹之功云爾。出沮澤之地，入

蒼莽之區，不務力耕，惟求遠迹，則於所征服之民，但使輸稅賦而止。貢之名，乃取諸異部族者，與取諸本部族之稅賦大異，夏后氏之貢法是也。

夏后氏之貢，實以稅而蒙貢名，蓋初施諸來服之異部族，後雖入居其部，征服者與所征服者，已合爲一，而其法仍未變也。

至此，則向特奴隸之耕作以爲養者，一變而衣食於農奴

之租稅矣。此吾國之封建社會也。自夏至於西周，此局蓋未大變？故尙論者多以三代並稱焉。孔子稱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

知，必有所據。禮卽法，惟俗相類，故禮相類，惟社會之組織相類，故俗相類也。

東周以降，種殖、製造之技蓋日精，通工易事之風亦益盛，則斯民之生計漸舒，

戶口日增，墾拓日廣，道途日關，風尚日同，則可以興大師，則可以造利兵，則可以遠征，則可以久駐。所征服之國能供億也。吳入

郢能久留者，以郢故都會也。

生事之演進，無一非軍事、政事之先驅，而統一之業，與資本之昌駢進矣。然以吾國疆域之廣，水

陸程途之修阻，風同道一，固非一蹴可幾，地方豪右及政府所命官吏之桀驁者，蓋罔不乘隙思逞，一旦中樞失

馭，則紛然並起而圖割據矣。此州郡藩鎮之禍所由來也。瘠土之民，脫沃土之富厚而思攘奪之，勢也。吾國東南

臨海，大軍不能飛越，西南則山嶺崎嶇，處其間者不能合大羣，亦無由成爲強寇，惟漠南北之地，既瘠苦足資鍛

鍊，又平夷有利驅馳，每爲侵掠者所根據，而河、湟、青海之間，亦其次也。爭戰必資物力，瘠土之民，固非沃土之民

之敵，漢、唐盛時，所以能威棱遠憚者以此，然自來操政治之權者，多荒淫而無遠慮，睹異族之臣服，則苟利一時

之休息，而不暇維萬世之安，而官吏、豪民，又利其可供賦役，恣虐使也。如後漢之苦役降羌，晉世并州多以匈奴爲佃客，且掠賣胡羯爲奴婢是也。則使之

入居塞內，而風塵有警，又驅其人以爲兵，於是太阿倒持矣。此五胡及沙陀、契丹、黨項之禍所由來也。孔子所謂

大同，卽古共產之世也。其和親康樂無論矣。封建之世，黷武之族，雖坐役殖產之民以自活，然其所誅求者，亦稅賦力役而已。於所征服之族社會固有之組織，未嘗加以破壞也。以力脅奪，所得究屬有限，而歷時稍久，且將受所征服之族之感化而漸進於文明，故封建之世，社會之規制，尙未至於大壞。猶之人體，雖有寄生之蟲，猶未至於甚病，故孔子稱爲小康也。至資本主義既昌，則昔時之分職，悉成爲獲利之彰，盡墮壞於無形之中，社會遂變而爲無組織，而民之生其間者苦矣。東周以降，仁人志士，日怵目劇心，而思有以移易天下，蓋由於此。然斯時之社會，其體段則既大矣，其情狀則既隱曲而難明矣，而生其間者，利害又相齟齬而不可合，凡所措置，所收之效，悉出於豫期之外，而事變之來，又多不可捉摸，則安得不視社會爲無可控制，不能以人力改造，其惟務抑壓一己，以求與之相安，亦固其所。故新室與東漢之間，實爲古今一大界。魏、晉以後之釋、老、宋、明兩代之理學，實改造社會之義既湮，人類再求所以自處，而再敗績焉者也。此又其所以若相反而實相類也。讀隋、唐、五代之史者，其義當於此求之。

中國之史，非徒中國一國之史也，東方諸國之盛衰興替，蓋靡不苟焉，卽世界大局之變動，亦皆息息相關，真知史事之因果者，必不以斯言爲河漢也。此其故何哉？世界各民族，因其所處之境不同，而其開化遂有遲早之異，後起諸族，必資先進之族之牖啓，故先進之國之動息，恆爲世界大波浪之源泉焉。先進之國，在東方爲中